

新疆郵電史誌資料匯編

(三)

一九九〇·七·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郵電管理局郵電史誌編輯室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郵電管理局郵電史誌編輯室

新疆邮电史志资汇编

第三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史志编辑室编

一九九〇年七月一日

新疆邮电史志资料汇编

(第三辑)

目 录

转 载:

- 在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江泽民 (1)

文献辑要: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关于1989年工作总结与1990年工作要点 (4)
西北、内蒙六省区邮电志编纂工作座谈会纪要 (8)
原北京邮区各省史志工作会议纪要 (10)

史志资料:

- 帝国主义与中国邮政 霍锡祥 (11)
近代新疆交通运输、邮电事业概况 云帆 (21)
“力群电台”的设立及其历史贡献 郎涛 (32)
新疆邮电事业基本建设 许鸿明 (39)
新疆电信通信的回忆 李润德 熊运泰 (42)
我区邮电通信事业必须有个大的发展
——记自治区邮电管理局局长解治常 刘尧锡 张学仁 (46)
邮路畅通 英雄辈出 哈的尔·巴拉提 (47)
发展邮电通信适应对外开放和商品经济发展需要 王凤禄 (49)
自治区邮电部门八年改革的回顾 杨春湖 (51)
电波传五洲 天涯若比邻 李仁虎 (55)
市内电话“病情”诊断 费隽 (56)
西行漫忆 张嘉丽 (57)

丝绸之路纪行:

- 若羌、且末——飘浮在茫茫沙海中的两片绿叶 刘尧锡 (59)
火洲滚烫乡邮路 刘尧锡 张娟 (62)

龟兹古道话沧桑.....	刘尧锡	(64)
喀什——丝路上闪爍的明珠.....	刘尧锡	(66)
帕米尔，撒落缤纷的思恋.....	刘尧锡	(68)

史志探讨：

编写《陕西省志·邮电志》“机构沿革”篇的体会.....	陕西省管局史志办	(71)
漫谈《邮电志》竖写的灵活性.....	甘肃省管局史志办	(73)
试写《青海省志·邮电志》第一章“机构沿革” 的几点体会.....	青海省管局史志办	(76)
新编《邮电志》探讨的几个问题.....	新疆区管局史志办	(78)

修志试笔：

新疆邮电工运大事记（一九四九年——一九八七年） (征求意见稿)	翁世炜 方杰	(83)
--	--------	------

• 转载 •

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江泽民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地方志工作。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曾积极倡导。1956年，编纂地方志曾列入国家科学十二年规划二十个重点项目之一。1980年以来，中央领导同志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倡，1983年、1985年中宣部、国务院曾就开展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先后发过文件。国务院正式把编修地方志工作列入国家“七五”规划。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关怀下，全国出现“盛世修志”的喜人景象。

上海市委已于去年8月，正式批准成立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工作机造——地方志办公室。去年5月5日，市委召开常委会，专门讨论了地方志工作。今天，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召开成立大会，我代表市委、市政府表示热烈的祝贺。

现就如何做好地方志工作谈几点看法：

一、编纂上海新方志的意义

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断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方志作为“一方之全史”，是记载一个地区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自然到社会，从政治到经济，从历史到现在，从人物到风貌，一应俱全的全面、系统、准确的社会大观的综录。古人曾概括地方志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编修新方志，将为我们党政领导提供翔实可靠的市情、区情、县情，为认识城市，研究城市，管理城市，为地方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为推进改革开放，振兴、建设上海起到积极的作用。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就是这个道理。

上海有着近六千年的悠久历史，为国务院命名的全国62座历史名城之一。上海不仅是我党最大的城市，也是名闻于世界的国际都会。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对外开放的港口。自1843年开埠以来，至今已近一个半世纪。上海是近现代旧中国的缩影。上海地方志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由于上海在全国所处的重要地位，编好上海地方志，不仅可以为上海的改造振兴提供宝贵的历史借鉴，也将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出重要的贡献。

近代的上海，曾经历过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和血腥统治，上海人民有着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优良传统。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上海人民在一个多世

纪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光辉。斗争历程中，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和名垂史册的英雄人物；解放以后，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人民又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新的地方志，是对广大市民，特别是对青年一代，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现实的、生动的、亲切的、富有说服力的教材。它从一个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将使人们懂得为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从而，启迪人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上海，激发起广大人民群众献身于改造、振兴上海的伟大事业的热情。

现在的上海，是历史上海的延续。上海旧方志，给我们留下了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宝贵资料。从宋代至民国，上海编纂过一百多种方志，其中有封建性的糟粕，但更多的是留存了极为丰富而又翔实的史料，是前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不能让编纂方志的历史传统中断。为给后世保留这一精神财富，同时编纂好新方志，也是我们这一代的历史责任。

编纂新方志，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工作，而是一项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不仅有近期社会效益，而且可以产生久远社会效益的意义重大的事业。

二、新编地方志的要求

编纂新方志必须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服务。为改造、振兴上海服务。我们要明确这是编纂方志工作的指导思想。

新编方志必须具有续格的科学性和鲜明时代特点。编纂新方志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我们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出真实地反映上海历史和社会实际的新方志。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旧方志的根本区别。

上海是我国经济、文化、科技、金融中心。上海这个现代化大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并不是任意确定的，而是由它的地理位置、自然条件、历史地位、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发挥的作用，以及与其它城市关系、与海外经济联系等条件所形成的。城市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把城市的诸多功能发挥出来。上海新方志要正确反映上海这个大城市的多种功能，这将有助于我们在城市建设发展上避免盲目性，更自觉地为把上海建设成开放型、多功能的现代化大城市而努力奋斗。

在今年4月间召开的市人代会和市政协会议上，人民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要宣传上海的历史文化，对上海人民进行爱乡、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教育，使上海人民了解上海、热爱上海，建设上海，以发挥上海历史文化的优势，把上海建设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这是一项重要的提案；编纂上海地方志是落实这一提案，使地方志为振兴建设上海服务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编纂地方志已经列入国家“七五”规划，正式进入国家工作序列。编纂新方志是涉及面广、工作复杂的艰巨任务，必须要有一个比较符合上海实际的工作规划，才能思想一致，目标明确，把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协调一致，更好更快地完成上海的修志任

务。

三、加强领导，搞好方志工作

1. 各级领导重视地方志工作

修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各级领导要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重要事业来抓，并切实抓好。

修志工作涉及到各个方面，必须动员各条战线共同努力才能搞好；缺少任何一个部门或行业，都会使地方志失去完整性。各方面的领导要认识编修新志的重要性，共同努力为编修新方志作出贡献。

市委、市政府已经批准了市地方志办公室制订的“七五”期间本市修志工作规划。上海的情况复杂，各部、委、办，各区、县、局，要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和工作条件，制订规划，有领导，有步骤地切实把这项工作开展起来。

2. 要切实解决修志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

编纂地方志是一项百年大计，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业，要编纂一部上海新方志，决非三年五载能够完成。地方志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各部门、各单位要给地方志机构以必要的工作条件。要从实际出发，建立必要的修志工作班子，并使它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的权威性。注意吸收一些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参加，注意吸收专家、学者和各条战线有丰富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尽管地方财政比较紧，但必要的修志事业经费是需要花的。其他的用房、设备等问题，各部门、各单位也应尽可能地给予适当解决。

3. 逐步建立起一支精干的修志队伍

编纂地方志的工作量大，复杂，要求高，要提高修志队伍的素质，提高修志队伍的马列主义水平、政策水平、业务知识和专业理论水平，逐步建立起一支具有开拓和献身精神，并具有较高理论、业务素养的修志队伍。

上海编纂地方志工作比起其他兄弟省市起步晚了些。上海有着丰富的方志资料资源，有一批史志方面的专家、学者和一批长期在上海领导和从事革命斗争的老同志，只要我们加强领导，依靠同志们的努力，把各方面力量组织起来，一定能够编好社会主义第一代的上海地方志。

（原载《上海修志向导》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转自《青海邮电史料选编》第四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文件

新方志发字(1990)2号

1989年工作总结与1990年工作要点

(一)

一九八九年，在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围绕贯彻落实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开展了各项活动，取得了明显的进展。

一、召开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召开了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这是自一九八四年底自治区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以来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总结了我区开展地方志编纂工作的经验，制定了今后的工作规划，提出了加强领导，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尽快地完成修志任务的措施。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富文同志在会上作重要讲话，部署了今后的修志任务，并就当前修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对各地各单位提出了具体要求。

会后，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狠抓了这次会议的贯彻落实工作，承担《新疆通志》各专志编修工作的自治区各部、委、办、厅、局有四十七家先后召开了各专志的编委会，认真传达会议精神。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以及昌吉、巴音郭楞、乌鲁木齐市、哈密、阿克苏、克孜勒苏、伊犁、博尔塔拉、喀什等专州先后召开了地方志编委会或史志工作会议，总结前几年的修志工作，落实今后的任务。还有部分县市召开了县市志编委会，贯彻落实自治区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这期间，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的专职副主任、委员和有关部门的人员还先后到十四个厅局以及伊犁、博尔塔拉、吐鲁番、巴音郭楞、克孜勒苏、阿克苏、和田、喀什等地州及其大部分县市调查研究，了解情况，帮助解决修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检查督促各地

认真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促进了各地的修志工作。

二、进一步抓好修志工作，加快修志速度。

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后，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批准了《新疆通志》编纂方案，对《新疆通志》作了全面规划。为了快出成果，一九八九年我们对《新疆通志》各专志和地县市志编室工作，采取了重点和一般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督促检查，分类指导，促其尽快脱稿。《新疆通志》编辑室重点抓了《民政志》《物价志》《人物志》三部志稿的修改工作，同时还抓了原定一九八九年完稿的其它十二部志稿。地县志工作室重点抓了《哈密县志》和《阿克苏市志》。到年底，《通志》的《人物志》明代以前的部分已脱稿并送有关专家查阅；《民政志》正抓紧修改，一九九〇年上半年可定稿。《哈密县志》经过审定验收已于年底付印。在抓重点的同时，还加强了面上的工作，为此，通志召开了两次大型的评稿会，分别就政治文化类和经济类志稿的一些初稿进行了评议。同时还参加了一些单位召开的评稿会，落实了文化、轻工、供销、新闻、共产党志等志稿的编修任务。地县市工作室利用库车县志评稿会的机会召开了南疆片会，和田、喀什、克孜勒苏、阿克苏、巴音郭楞、吐鲁番六地州和大部分县志编辑室主任或主编参加了会议。同时参与了阿克苏市志、库车县志、博乐市志、木垒县志、轮胎县志、若羌县志等九部志稿的评议和修改工作。此外，这两个部门还接待了各厅局和地、州县市志的同志，帮助他们解决修志工作中的问题。经过修志工作者的努力，一九八九年，建国后我区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哈密县志》已经正式出版，它标志着我区修志工作已开始进入出成果的阶段。

三、《新疆年鉴》汉、维文版继续得到改进。

一九八九年的新疆年鉴汉文版已于九月底按时出版发行。这期年鉴，在结构上进一步做了调整，使整个框架结构更加合理，更好的反映自治区的实际，并且突出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更好的反映时代特点。特别是地州市县建设部类有较大的改变，既有保持资料连续性的稳定性条目，又有反映地方特点和当年特点的机动性条目，读者反映比较好。其次，去年年鉴篇幅大大减少，压缩了近十个印张，由于在条目撰写和编辑过程中减少动态性条目，减少大条目，所以，年鉴篇幅虽然压缩了，但资料性并没有减弱。第三，经自治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去年年鉴扩大了广告业务，刊登了136幅广告，广告收入全部补充事业费，缓解了事业费不足，减轻了国家负担。

维文编译室在人力紧张的情况下，提前完成了年鉴编译出版工作，质量有所提高。同时，还组织编辑了一部历史术语词典，此书已发排付印。

四、机关管理工作有新的起色。

一九八九年，机关的财务工作、行政管理工作、资料工作、微机等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一九八九年，财务工作跟参事室完全分开，经费开支做到精打细算，保证业务工作的需要。在行政工作上，维修了房屋、院落，解决了吃水难的问题，改善了居住条件。修复了政府给的旧面包车，解决了交通车的问题。在政府的关怀下，办公室搬至工会大厦，改善了办公条件，特别是改善了资料室的条件。在这之前，资料室的同志在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尽量做好工

作，为我委和各地各单位修志人员查找资料提供了方便。去年，在自治区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关怀下，财政拨款12.7万元用于微机排字系统的建设，成立了知青印刷社，为修志服务。印刷社一面进设备，培训人员，一面承揽业务。全年收支基本平衡，年鉴发行工作去年也有所改进，基本上完成了一九八八年年鉴发行任务。

五、学会工作初步展开。

去年三月，在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新疆地方志学会正式成立，选举产生了学会的领导机构，通过了学会章程。学会成立后，首先抓了发展会员的工作，截至去年七月，已发展团体会员76个单位357人，收会费5253元。其次，办好刊物，成立了《新疆地方志》编委会，确定了主编、副主编等，还提出了改进刊物组稿、编辑工作的意见，保证了刊物按期出版（汉文出版四期）、维文出版两期），第三、组织会员写论文。共收到各地会员寄来的论文13篇，选出五篇送全国地方志协会召开的学术年会，其中钟兴麟和钟英同志合写的《方志学与区域发展研究》被选中，钟兴麟同志于去年十一月参加了在湖南岳阳召开的全国志协学术年会。

六、干部政治思想状况基本稳定。

一九八九年，对我们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全国不少地方发生了动乱，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新疆也发生5·19政治骚乱事件。动乱期间，我们单位没有人上街游行、写大小字报、搞声援，基本保持了机关稳定，工作秩序正常。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呢？①平时我们坚持做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正常的政治学习，大家对社会主义道路，共产党的领导等这些基本的信念没有动摇；②我们及时组织大家学习了“四·二六”《人民日报》社论，学习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领导同志的几次讲话，明确提出要坚守岗位，不参加游行、不搞声援等活动；③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统一党员思想认识。平时，党支部注意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党支部。

总之，在过去的一年，我们的修志工作已经开始出成果，年鉴工作继续得到改进，学会工作也初步展开，机关管理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干部政治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好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比较好地完成了一九八九年初提出的各项任务。但是，我们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

第一，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在部分地区和单位还没有很好的贯彻落实。据了解，去年三月召开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后，尚有少数地州没有开会或采取适当方式传达学习和贯彻落实这次会议精神，部分县市也没有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精神。以致一些县市修志工作中老大难的问题仍没有很好解决，比如铁木尔·达瓦买提同志在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明确讲到的领导重视问题以及解决必要的经费、人员问题等，在有些地县和自治区有些厅局还没有很好落实。

第二、在认识上，我们对修志工作的难度估计不足，主观愿望上想又快又好完成这届修志任务，但从实际上看，出一部志书很不容易。去年，我们原计划出一两部通志专业志和一两部县市志，费了很大力气，勉强出了一部县志。

第三、工作中的差错还比较多，工作作风不够严谨。地方志编委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主

管修志和编辑《新疆年鉴》，工作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出版物的质量。去年，我们工作中的差错还比较多。《新疆年鉴》、《新疆地方志》等都出现过错误。去年《新疆年鉴》环衬地图绘制出现差错，改绘后重印不仅造成经济损失，而且造成不良影响。对工作中出现的这些差错，首先领导承担责任，重大问题我们都做了自我批评，有关同志大都也做了自我批评，有的在会上做了检查。

第四、政治思想工作有待加强。前面已讲了，我们单位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基本上是好的，正因为这样，才能在这场动乱中经受住了考验，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存在的问题。去年，从领导上讲，在广告工作中经验不足，考虑不周，有失误之处，但有些同志思想上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当时，尽管我们多次强调，不要影响工作，但是有的同志还是影响了工作，而且影响了少数同志之间的团结，我们希望凡是同志之间有不团结现象的，双方多做自我批评，主动搞好团结

(二)

按照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的部署，一九九〇年，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的工作要以稳定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在这个前提下围绕贯彻落实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开展各项工作。

一、凡是没有传达贯彻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的地、州、市、县（市）和承担《新疆通志》专业志编修任务的厅局，希望上半年召开编委会或工作会议，传达学习铁木尔·达瓦买提和富文同志在自治区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结合总结本单位本地区的修志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制定出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修志进度的措施，力争尽快完成本地区、本单位的修志任务。

二、抓好《新疆通志》仍然是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的工作重点。今年，要求《民政志》出版发行。通志编辑室承担的人物志解放前卷年终定稿。重点抓的其它11部专志继续抓紧，力争《物价志》、《法院志》、《工商志》、《广播电视志》年终定稿，同时对工作处于其它的专业志加紧分类指导，促其加快进度。

三、地县志工作的重点放在出成果的单位，适当照顾面上的工作。要力争《阿克苏市志》《轮台县志》《巴里坤县志》出版发行。鉴于今年将有十多部县市志送地州一级审定，为了保证县志质量，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准备向自治区人民政府写出报告，请批转各地州市务必十分重视县志的审定工作，把好出版关。

四、今年《新疆年鉴》的编辑工作要求做到：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上同中央高度一致。二是更全面地反映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三是篇幅大体和去年相当。四是改变装祯设计和改进框架结构。五是改进广告组稿办法。六是采取坚决措施，把差错减少到最低限度。

五、编译工作：今后编译工作的重点要从编译年鉴逐步转移到通志和地县志工作方面来。今年要做好调查研究工作，掌握通志和地县志编译出版情况。对已经出版和将要定稿的通志专业志和地县志要及时参预翻译工作，掌握翻译情况，保证翻译质量。下半年还要准备翻译或组织翻译《人物志》。为了搞好上述工作，编译室上半年要组织好业务学习。同时还

要继续做好年鉴供稿工作和《新疆地方志》维文编译出版工作。

六、学会工作：继续办好《新疆地方志》刊物，努力提高质量，减少差错。同时开展学术活动，提高修志队伍的业务素质，争取年内开一次学术年会。

七、机关管理工作：继续做好财务工作，车辆管理工作、资料工作、年鉴发行工作、尽量搞好集体福利。

八、知青印刷社的工作：经营方向是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坚持为修志服务。为此：①改善设备条件。汉文方面不再投资，维文可再化点钱，尽快上维文软件。②改善经营管理，制定知青印刷社章程，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学习制度、工作福利制度等等。

九、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制度建设包括集体领导制度、各种工作责任制以及保密制度等等。继续策倡“三严精神”即严肃认真、严谨细致、严格要求。对志书一词一句，一事一数都要反复查对，做到准确无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一九九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西北、内蒙六省区邮电志编纂 工作座谈会纪要

一九八九年度西北、内蒙六省区邮电志编纂工作座谈会，于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在西安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区局史志办的负责同志和主编、编辑同志，西安市邮政局、电信局编志室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共计十五人。

陕西省局党组书记、局长张作瑛同志会前看望了大家，会议结束时参加了会议并讲话。

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交流编志工作经验，交换资料，互通信息，研究讨论在编写邮电志中的指导思想、突出的重点，以及编写的体例、内容、方法等。

会议上，各省区局都介绍了一年来编志工作进展情况。甘肃省局已将邮电志初稿共二十一章全部编写出来，已经打印出来十章，交付打印二章，还有九章正在修改。陕西省局去年以来又编印了近40万字的第二辑《陕西省邮电史志资料》，并编写打印出“机构沿革”篇的初稿。青海省局克服重重困难，编写出了“机构沿革”章初稿，还编印了三辑《青海邮电史料选编》。新疆区局采取承包办法，将编写任务落实到各部门，为《当代中国新疆》编写了《新疆邮电通信事业》的稿件，并又编印了第二辑《新疆邮电史志资料汇编》。宁夏区局收集了100余万字的资料，并于去年宁夏三十年大庆时，编写出版了《前进中的宁夏邮电事业》一书。内蒙区局加强了编写力量，继续收集资料并落实了农话、机要、集邮、发行、供应等部分志稿的编写任务。编写了庆祝国庆四十周年的《改革——邮电通信蓬勃发展的动

力》稿件，同时还抓了各盟、市编写志书的工作，推动了全区邮电志的编写工作。

这次会议，各局充分交流了编写邮电志工作中的经验。甘肃省局介绍了“漫谈邮电志竖写的灵活性”；陕西、青海省局介绍了编写“机构沿革”篇（章）的体会；新疆介绍了“新编邮电志探讨的几个问题”；内蒙、甘肃、陕西等局还交流了有关编志中的指导思想，篇目设计，如何突出重点，如何体现专业特点、时代特色、地方特点，如何掌握志书的详略问题，怎样反映“文化大革命”问题，如何反映以事系人，以及写作中的文风等方面的经验。

与会同志就编写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认为：

第一、编写邮电志工作，应取得领导的重视和支持。目前编写任务大、力量不足，有些任务还没有完全落实。有的局编写人员少、业务素质差，需要充实加强，有的局编纂室负责总纂工作，并承担一部分篇章的编写任务，将其余篇章编写任务分给相关处室和部门承担，但有的至今还未落实编写人员，这些问题需要向各局领导汇报，取得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以期妥善解决。鉴于史志工作在全国各地都已深入开展，但在邮电部门尚无统一领导机构来抓，根据邮电部杨泰芳部长在全国邮电文物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建议邮电部设置专门机构，加强对邮电史志编纂工作的领导。

第二、资料方面问题比较多、困难比较大。有的局感到资料收集工作差距还很大。进入编写阶段后还有资料缺头、少尾、断线等情况。有的资料还不够准确，需要多方去考证。过去没有找到的资料，现在再去找，也很不容易。为了加强资料的收集工作，今后各局应进一步加强协作配合，互相交换史志资料目录、交换史志资料选编、通讯等，与会各局协议，由陕西局牵头共同收集交流和编辑西北地区的邮驿史料。

第三、提高邮电志的编写质量。目前各省、区局编写出的部分篇章和部分基层单位编写出的志书，普遍感到质量不高。有的未经很好修改、审查即行出版，其中：体例不符，内容不全，资料不准确，文字不符合行文规范等问题很多，建议各局互相进行评议，对于已经写出的初稿应反复核实、平衡、推敲、补充、修改，严格审稿制度，未按规定程序审批不能出版，以确保志书质量。

与会同志认为，每年举行一次协作区的邮电志编写工作会议，对各局的编写工作促进很大，通过协作会，互相交流经验，取长补短，交换资料，提供信息，探讨编写中共同遇到的问题，达到共同提高是非常必要的。经共同商讨，确定明年西北及内蒙六省区邮电志编纂工作座谈会由青海、宁夏省（区）局共同主持，在西宁市召开，讨论的议题、具体时间由青海、宁夏两局确定，提前通知各局做好准备。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会议纪要

原北京邮区各省史志工作会议于一九九〇年一月九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等省市邮电管理局及天津市邮政局的史志办公室负责同志。邮电部邮电博物馆也应邀出席了会议。

会议认为，随着编史修志工作的深入开展，加强各省之间的横向联系，进行学术交流的必要性愈益突出。靠“闭关自守”，是写不出一部“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高标准、高质量的邮电史志专著的。鉴此，会议决定成立由与会各省市局（包括新疆局）和邮电博物馆参加的“北京邮区史志工作协作组”，其任务是：探讨撰修邮电史志的方法，进行学术交流；互通各省市局修志信息，协调工作进度；为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组织联合查档，使各局摆脱缺少资料而陷入的困境；根据协作组成员局的要求，对其撰修的志稿进行审评，以确保质量。

协作组聘请北京邮局原代局长罗英同志为顾问，推举北京市邮政局史志办主任马俊昌同志和天津市邮政局史志办主任赵鸿钧同志为总联络员。

会议认为，为保证协作组工作的顺利开展，每年举行两次研讨会是十分必要的。协作组请河北省邮电管理局史志办公室组织今年的第一次协作组研讨会。

北京邮电史志工作协作组

北京市邮政局史志办代章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二日

帝国主义与中国邮政

霍锡祥

一、帝国主义攫取我国邮政的开始

关于我国新式邮政的起源，应追溯到鸦片战争，清朝政府受到帝国主义武力威逼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八四二年中英江宁条约里规定了英国人可以带同家属寄居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也规定了英国领事、管事等可以与地方官公文往来。一八五八年同英法订立的天津条约又规定了：“英国钦差、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送文专差同样受到清国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后来，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等国借口“利益均沾”，也迫使清政府担负了保护各国使馆送文专差的责任。由于办理上感觉不便，改由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交由驿站代寄；随着文件到来，随时递送。那时各口海关税务司文件往来，原先也是由总理衙门代寄的。北京与天津之间，用邮差往来投递。但在天津海口封冻时期，北京使馆的邮件须改由镇江寄发，用了马差在北京和镇江之间往来，途径很长，也很不安全。总理衙门因而有将这项运寄邮件事务交移总税务司署办理的决定。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海关开始试办邮政，在总税务司公署内添设了邮务办事处。次年十二月又将海关冬季设置的邮寄办法，推行到居住天津的外侨，但只以洋文信函为限。这是由公务文件渐渐推广到私人信件的开始。

一八七六年（清光绪二年）清政府和英国商订烟台条约时，总理衙门派赫德（Robt Hart）总税务司通知英使威妥玛说：

“如邮政亦可视为该条约范围之内，总理衙门即可核准创办全国邮政”。结果，条约内并未列入。可是在总理衙门给总税务司的交办事项单内有“通商口岸及就近地方，设立送信官局，由总税务司管理”的一项。这就是海关试办邮务，开始推广并收递华洋人民信件的根据。一八七八年（清光绪四年）起，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处，设立送信官局，略仿西洋办法，开始收寄人民信件，发行首批海关邮票。同年，九江、镇江两处也开设送信官局。这是邮政设局试办的开始。

邮件班期经整顿后，逐渐正规化。北京、天津间开办了定期骑差邮路，每次带运邮件以四十磅为限，费用每月银一百十两。天津外国人寄北京的邮件，是从一八七八年三月二十三日开始收寄的。当时李鸿章也命令各兵舰统带将开始时刻，通知牛庄、天津海关，附带运寄邮件。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 Detring）奉派管理邮政事务，又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上海各处试办华洋书信馆，由本地商家设立，代理收寄邮件。经费收支自理，海关只担任运送。

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十一月）海关内部开始设立“邮政专帐”，并派德璀琳为邮政司，整顿各埠设立的邮务办事处，天津成为汇总机关，一面采用海关“拨驷达”（post）书信馆字样，作为海关建立邮政办事处的华文名称。所有收寄的华洋文邮件，手续均同，商人设立的书信馆因办理不善，

不再试办。一八八年总税务司制定海关邮局规则五条，规定温州及其以北各海关邮政办事处一律对外设置信箱，接受公众交寄信件，并出售邮票；温州以南暂缓办理。

一八八五年（清光绪十一年）候选州同李圭建议浙江宁波道薛福成试行办理邮政。薛福成和宁波海关税务司葛显礼（N. Ko psch）商量加意见，转报总理衙门，交总税务司筹议。认为：“此举裕国便民，为办得到之事，至海关所兼办之邮递，因与国家所设体制不同，故推广每多窒碍”云云。一八九〇年总理衙门通知赫德在通商各口岸推广办理。赫德复函说“数年来创办艰难，若不奏请设立官邮政局，以推广为抵制（客邮）之计，恐将另生枝节”。（关于“客邮”请参看后文）这是因为各国在华设立的客邮局正在扩展，加之上海工部局也正在商议添设各口信局。一直到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日（清光绪二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总理衙门议由海关现设邮递推广，并与各国邮政联系，根据赫德所拟章程奏准正式设立国家邮政，公布开办邮政全部章程。这是海关兼办邮政的正式开始。总税务司赫德奏派兼任总邮政司。在海关试办和兼办邮政时期，从一八六六年开始，在总税务司署内设立邮务办事处。在赫德下负责办理邮政的先后有天津税务司德璀琳、上海海关制册处税务司葛显礼（皆英人）及阿理嗣（J. A. Van Aalst 比利时人）。到阿理嗣调任三水海关税务司后，从一九〇一年起法人帛黎（T. piry）派任为在总税务司兼任总邮政司赫德下的“邮政总办”。（按这一名称虽和以后邮政脱离海关起的“邮政总办”在表面上文字相同，实权显有分别）。

海关兼办邮政，从一八六六年试办，一八九六年正式开办。直到一九一一年，邮政方才脱离海关独立，归邮传部管辖赫德独揽中国邮政大权整四十年之久。

二、邮政脱离海关，落入法国人的掌握

清代国家邮政正式开办，初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节制；后因总理衙门裁撤，乃改归外务部管辖。一九〇六年清政府预备立宪，改定官制，规定邮传部管辖邮政。但由于税务处成立，外务部所属的分立机关，海关和邮政，均改由税务处掌管。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奏请收回邮政，归部直辖。当年五月，实行与海关分离，邮政独立，直接由邮传部管辖。原在总税务司下之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改任为新设邮政总局的邮政总办。在总办之上设有邮政总局局长，派侍郎李经芳充任。可是局长毫无实权，一切邮政事务，统由帛黎处理。邮政大权原握在英国人手中，由此改由法国人掌握。

为了说明法国人掌管邮权的经过，当远溯自海关兼办邮政时期谈起。在试办时期英人赫德兼掌关、邮大权，还未引起其他帝国主义者过分嫉妒。到了正式开办邮政，通过各国公使正式照会，明确清政府正式创设邮政，赫德还兼任总邮政司，这就引起了英国的侵华伙伴法国人的注意了。就在邮政正式设立的第二个月后，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九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初七日）法公使施阿兰开始照会总理衙门说：“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招募外国人员时候，法国人也应公平地共同办理。”这是一个开端。此后一直纠缠不清，要求也逐渐增高。史料很烦琐，不便多引，只将最关重要的交换文件抄录于后：

根据清邮传部邮政司档案所载：一八九八年三月十三日（光绪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公使吕班致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说：

“照得前中国国家让于各他国最厚之利益，因有此等情形，法国国家必须将条约与我国所沾优待一律，并以先竭力相助中国等

事，倚讨相抵之据。此相抵之据，开列于后：中国邮政局总管一缺，法国人员充补。本大臣应请贵王大臣查阅所开并无伤贵国之权，又专系我国必须倚讨相抵之据，断不能少减。除贵王大臣与本大臣体谅两国彼此龃龉各节与中国关系甚重外，本大臣无疑将所讨详细查阅。”

同年三月二十日清政府总理衙门照会法公使呂班说：

“接准贵大臣照称：‘查迭晤之后，除赫奉全权字据外，我国专命照行，以坚固两国友谊邻邦之情，本大臣即请贵王大臣应允，开列如左：一、中国国家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特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本大臣应请贵王大臣照复，以便查阅彼此心意相同，用来往照会作据为要’等因；前来，本衙门查来照所称，既以坚固友谊为言，可允照办。嗣后中法两国，自当益敦教睦，永弭争端，相应照复贵大臣转报贵国国家可也。”

上引两个文件，便是过去研究邮政史料所称的“协定”、“换文”，也就是一向当为“不平等条约”看待的秘密外交文件。针对着为什么邮政洋总办必须由法国人充任这一问题，这两个文件，便是书面的根据。

一八九六年正式开办邮政，是在“中日战争”的后一年。由于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法国一直居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尽管法国在续订中法境界及陆路通商专约和其后要求海南岛不割让他国及延长龙州铁道等等所得甚多，但法国人总是认为不足。一八九八年帝国主义对清政府先后威胁分割港口，如英人独占扬子江流域、德入租借胶州湾、帝俄租借旅顺口等等。这样引起法人“贪婪之心大炽”。照会所说：“中国国家让与各他国最厚之利益”，便是指这些租借地等。“以先竭力相助中国等事”就

是指“三国干涉还辽”。所谓“倚讨相抵”，“彼此龃龉”，是要求报酬和功劳相当，如若不允照办，就将争吵动武，完全要流氓态度。“断不能少减”更暴露了法帝国主义的一副狰狞丑恶面貌了。因此，从“法国人公平地共同办理”竟然转变到“总管一缺，法国人员充补”。硬说是“无伤贵国之权”，认为不是租地割地，因而就不许讨价还价了。那时总理衙门的大臣是恭亲王奕欣。上述照会原件由法公使呂班亲去总理衙门面交奕欣。经过奕欣和呂班交谈几次，中间总理衙门还推托说：“邮政局已令总税务司试办，税务司所用之人，各国皆有，未便专归法员（当然这是奕欣和赫德商量后的决定）”，可是，法人无论如何，不能认为满意。就在照会送来的一个月间，往返多次，勾心斗角，奕欣处于赫德、呂班相互争持之下，也许英、法之间还有勾结或谅解，最后清政府才改变了一向采取推宕敷衍的方式，作了决定：“可允照办”。这四个字就构成了“法国人办理邮权”的法律自一八九八年一直到一九一一年，经过十多年，帛黎才得高居邮政总局总办的宝座。而且帛黎、铁士兰都还是赫德一手培养出来的。中间法国公使几次三番地介绍一些人来充任中国邮政“总管”，但都没有达到目的。

在帛黎任加邮政总办期间，一直坚持用PMG (postmaster General) 这一个英文头衔这是帛黎存心企图欺骗国际邮政视听的，因为在外国，postmaster General 是阁员之一（也就是部长地位）。帛黎到辛亥革命的次年五月，因病返法。另一法国人铁士兰代理总办，英文职称改为ADG (Associate Director General)。一九一七年正式任命铁士兰为邮政总办，才又改为Co-DG (Co-Director General)。

洋总办当政，自以为至高无上，藐视中国一切法律，在邮政处理问题上“PMC (后